

July 2024

The Western Origin of "Synthesis" in Yuan Kejia's Poetics

Yangben Bai
baiyangben@sdu.edu.c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Bai, Yangben. 2024. "The Western Origin of "Synthesis" in Yuan Kejia's Po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袁可嘉“综合”诗论的西方渊源

白洋本

摘要:“综合”是袁可嘉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新诗现代化”诗论中的关键策略。关于“综合”的西方渊源,研究者往往关注艾略特和瑞恰兹的影响,却忽略了史彭德,而后者是袁可嘉“综合”诗论的关键来源。首先,袁可嘉所述英国现代诗呈现从“分析到综合”(从“自嘲嘲人到怜悯”)的特征,其中的“综合”和“怜悯”皆可追溯至史彭德的诗歌和理论;其次,不同于艾略特和瑞恰兹切断艺术与生活的渗透关系,史彭德“融合”意识、经验与客观现实的“诗的社会化”理论,经由袁水拍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启发袁可嘉将“现实”列为“综合”的重要部分;最后,袁可嘉在同时代人译介的激励下翻译史彭德的“现代性”诗论,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由卡林内斯库的理论再次激活而成为袁可嘉诗论的核心。袁可嘉对左翼诗人史彭德诗论的借鉴,体现了京派知识圈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战时背景下的姿态调整和文学坚守。

关键词:袁可嘉; 史彭德; 综合; 现代性

作者简介:白洋本,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英美现代诗歌与中国新诗研究。通信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西路 180 号,264209。电子邮箱:baiyangben@sdu.edu.cn。本文系山东大学(威海)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交叉与融合’:外国文学课程中的‘中国问题’与‘域外资源’”[项目编号:Y2023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Western Origin of “Synthesis” in Yuan Kejia’s Poetics

Abstract: “Synthesis” emerged as a pivotal approach in Yuan Kejia’s proposal of “modernizing Chinese new poetry” in the 1940s. While scholars often credit the influence of T. S. Eliot and I. A. Richards in the Western origins of “synthesi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Stephen Spender is sometimes underestimated. Firstly, Yuan Kejia depi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British poetry as a progression “from analysis to synthesis” (“from self-deprecating mockery to pity”), with both “synthesis” and “pity” finding roots in Spender’s theory. Secondly, in contrast to Eliot and Richards, who sever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t and life, Spender’s notion of “fusing” ideas, experiences and objective reality into a single line or image greatly influenced Yuan Kejia’s inclusion of “reality” as a pivotal component of “synthesis.” Finally,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s allowed Yuan Kejia to convey Spender’s modernity theory in the 1940s, a concept reinvigorated in the 1980s through Calinescu’s scholarship. Yuan Kejia’s embrace of the Spender’s left-wing poetics exemplifies his literary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of wartime Beijing.

Keywords: Yuan Kejia; Stephen Spender; synthesis; modernity

Author: Bai Yangben, Ph. D.,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in the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with research focus on English and Chinese modern poetry. Address: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180 West Culture Road, Weihai 264209,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baiyangben@sdu.edu.cn.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form Fund of Shandong University (Y2023010).

袁可嘉以“新诗现代化”理论在 20 世纪中国新诗中占重要位置,他的诗论“标志着 40 年代中国诗歌

批评现代主义向度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准”(臧棣 85),而“综合”是其“新诗现代化”系列诗论中的“中

心和重点”(蓝棣之 6)。很多评论家称赞其独特的中国问题视域和理论观点,但关于“综合”所涉及的西方渊源,仅有少数批评家(如蓝棣之)有所涉及并归于艾略特和瑞恰兹的影响。然而,袁可嘉却在文章中指出,现代诗中“综合”的最佳代表不仅包括艾略特,还包括史彭德(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诗的发展》3)。这指明袁可嘉的“综合”不仅受到艾略特的影响,更与史彭德密切相关。

史彭德(Stephen Spender, 1909—1995年)^①是英国现代诗人,“奥登一代”的成员之一,也是对“现代性”颇有研究的批评家,曾出版《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诗》(*Poetry Since 1939*)、《现代人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等批评著作。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分析“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在诗歌批评史中的出现和发展时指出,第一位与此话题有关的重要理论家是兰瑟姆,第二位便是史彭德(91—96)。

更重要的是,史彭德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讨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有八篇文章被袁水拍、俞铭传、陈敬容等中国诗人翻译,刊登在《文学杂志》《诗创造》等重要期刊上。袁可嘉不仅与多位译者熟识,而且与这些期刊联络密切,正是在这些译文的指引下,袁可嘉后来翻译史彭德专门论述“现代性”的文章《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同样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史彭德的诗论通过这些中国诗人的译介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诗人唐湜在1948年的文章《诗的新世代》中便指出,对“自觉的现代主义者”而言,史彭德是“他们的私淑者”(唐湜 20)。

本文以袁可嘉诗论中的“综合”为核心,考察史彭德的诗歌和诗论对他的影响。首先讨论袁可嘉对英国现代诗歌的分析,揭示其“综合”概念的诗学源头在于史彭德的诗歌和诗论;其次考证袁水拍等同时代人的译介对袁可嘉产生的启发,这促使他进一步翻译并接受史彭德的观点;最后分析“综合”与“现代性”的关联,揭示史彭德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从而串联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相关论述背后的一贯线索。本文借助以上讨论指出,史彭德的诗歌和诗论是袁可嘉提出“综合”诗论的文学渊源和诗学基础,而通过论述袁可嘉对左翼诗人史彭德诗论的借鉴,既可以呈现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的西方渊源和本土回应,也可以透视袁可嘉等京派青年在战争年代中的姿态调整。

一、“综合”:有“态度”的“怜悯”

袁可嘉在1947年3月30日发表的《新诗现代

化——新传统的寻求》(以下简称《新诗现代化》)一文中,提出“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将其视为“新诗现代化”的关键策略(袁可嘉,《新诗现代化》9)。袁可嘉之所以将“综合”视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是受到西方现代诗的启发:要了解“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9)。何为“西洋诗的实质”,他自己“亦屡曾提及”,而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西洋诗的特质概括为“高度综合的性质”(9)。按照袁可嘉的说法,现代诗的“综合”特质是他从西方现代诗借鉴而来的,由时间推算,他“曾提及”的自己对西方现代诗的分析应该是发表于1947年1月18日的《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诗的发展》(以下简称《从分析到综合》)一文。由此可见,《从分析到综合》既体现他对“综合”的主要理解,也可反映“综合”诗论的西方渊源。

袁可嘉在《从分析到综合》中指出“综合”是现代诗歌的特征之一,从艾略特、奥登到史彭德的诗歌,“现代英诗”呈现“从分析到综合”的特征(《从分析到综合》3)。也就是说,最彻底表现“综合”特质的是史彭德:“现代诗中的综合倾向,经历甚久的潜流与酝酿”,后来才“取得完整的表现”,代表之一便是“史本特的《维也纳》”(3)。虽然“分析”和“综合”并非完全互相排斥,但为何史彭德比艾略特、奥登更多体现“综合”特征,更少具有“分析”特性?这需要分析三者表现“综合”的不同方式。

艾略特的诗歌表现“分析”特质,具体呈现为“自嘲嘲人”的态度。“分析”是指诗人“采取现代飞行员的观点,即把个人从广大社会游离出来,置身高空,凭借纯理智的活动。俯视脚底的大千世界”(《从分析到综合》3)。当诗人采取这样高空俯视人间的视角时,“现代社会的病态弱点尤其析然可辨”,“现代诗人的分析能力便取得愤世嫉俗(Cynicism)的形式”,而艾略特诗歌中的“自嘲嘲人”“尤其可作代表”(3)。虽然艾略特诗歌的主要特质是分析,但也有“综合”,“艾略特所提供的综合方式是宗教信仰”(3)。不过,艾略特的“综合”并不接纳现实世界,相反,他对现实社会抱有颇多怀疑甚至否定:“除十分强调忍受苦痛的德性以外,艾氏对人类意识在其他方面的积极活动不仅不甚感觉兴趣,而且颇多怀疑。”(3)

与艾略特“自嘲嘲人”的“分析”相比,奥登和史彭德更多“悲愤”地“抨击社会”,具有“社会综合”的特质。奥登、史彭德与艾略特不同,他们相信积极行动具有意义,因此“他们似乎比较宽恕个人的罪,而集中抨击社会制度本身及因而产生的种种畸形病态”;

他们“自嘲的成分”较少,而“悲愤情绪”较多(《从分析到综合》3)。也就是说,奥登和史彭德的诗歌重心不在于分析“个人的罪”,也不在于渴盼救赎,而更多地关注“个人”之外的“社会”,更希望通过“抨击”现实来改造社会,具有“社会综合(Social Synthesis)”的特质(3)。袁可嘉对这种“社会综合”的倾慕,也让他对奥登后期的转变持否定态度。在袁可嘉看来,奥登在后来也走了艾略特的旧路,奥登“极类似艾略特的对于神的向往,这在他较晚的另一诗剧《目前》(For the time Being)中尤其有极露骨的表现”(3)。

现代诗经过艾略特、奥登的发展,诗人逐渐从自嘲、悲愤变为怜悯,并促使诗歌从“分析”发展为“综合”,史彭德便是“综合”特征“完整”的代表。史彭德与最后走向宗教的艾略特、奥登不同,“他似乎以更多的精力来暴露战争的罪恶,予以抨击”;“史本特[……]显然认为只有以暴力获取外在的改变才能改变内心,就过程而论,恰是艾略特综合方式的对照”(《从分析到综合》3)。袁可嘉分析史彭德对文明的批判、对自身的怜悯,目的是证明:现代诗中的“分析性已从自嘲嘲人,经过悲愤而趋向怜悯,也即是逐渐接近下文中所要提及的综合性”(3)。袁可嘉这里的“下文”便是小节开头时引用的文字:“史本特的《维也纳》(1935年)是“现代诗中的综合倾向”“取得完整的表现”的代表之一。此外,袁可嘉再次引用史彭德的诗歌《一九四〇年六月》以证明“综合”即“怜悯”,他指出:“在史本特许多描写战争实况的诗篇里也存在着这一基本看法的不同说法;现代战争没有意义得令人发笑,残酷凶狠得令人痛恨,而内涵于战争的芸芸众生的牺牲痛苦又无不引致悲悯。”(3)也正是因此,袁可嘉借用一战诗人欧文(Wilfred Owen)的话:“诗在怜悯(Poetry is in Pity)。”(3)

袁可嘉认为诗歌是“怜悯”的观点源自史彭德。史彭德在著作《破坏性因素》(*The Destructive Element*, 1935年)的第七章专门讨论“诗歌与怜悯”,而袁可嘉对此书颇为熟悉。^②在这一章的开头,史彭德借用欧文的诗歌指出:“我的诗歌主题是战争,和对战争的怜悯/诗歌就是怜悯(The poetry is in the pity)”(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17)。

欧文、史彭德关注诗歌与怜悯,既反映他们所处的战时历史背景,也体现史彭德诗论中的政治关怀是指广义的社会关怀。欧文是著名的一战诗人,而史彭德当时正处于“破坏性因素”的笼罩之下:一战留下的残局、英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日益显露的法西斯极权主义。这些“破坏性的因素”促使史彭德更加关注社会,也更多具有政治关怀。不过,

左翼诗人史彭德指出,即便一个诗人有政治关怀,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依旧是“如何表达心灵的态度:例如爱或者怜悯”(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17)。“怜悯”或“爱”是一种“心灵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为了某种实际的利益,更不是为了满足政治理念,“有怜悯的态度——怜悯虽然很强烈,却没有任何安慰的实际作用——对他而言是面对战争的唯一合适的方式”(217)。所以这种“爱的态度”和“爱的道德”有差异,只有前者才是“对于诗人正在描述的经验所恰当的”(217)。史彭德用这些文字来解释欧文为何认为“诗歌就是怜悯”,而对欧文诗句的借用和解释,也更清晰地说明史彭德诗歌中的政治关怀:不局限于某个政治观念,而更应该是对战争中芸芸众生的有“态度”的“怜悯”。

“怜悯”是“综合”的情感基础。史彭德在探讨欧文的诗歌与战争的关系时发现,当诗人面对“超越他控制能力的战争”时,“那些痛苦的外部环境压迫着他,他的工作就是去通过接受这些东西并创造一种综合(create a synthesis):他所能做的最多也只能是接受它们”(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18)。“怜悯”或“爱的态度”有助于实现这种“综合”:爱的态度不是以“傲慢”的姿态批评他人的观念,而是“深刻地以他的整个存在”,“克服巨大的习性”,“接受他所爱之人的观念”(194)。基于这种人性的理解,人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以怜悯和理解”接受恋人之吻,“正如我接受思绪中的所有事情并将之视为生命——继而成为艺术的恰切主题”,那些即便个别而平凡的,也普遍化为“整个宇宙的一个部分”(196)。以一种“怜悯”的态度面对残酷的战争,而不是像艾略特那样嘲讽或逃避世界,那些“压迫”着人的痛苦经验,才能找到与之“恰当”的“描述”方式。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的人生“态度”,这种有“态度”的“综合”是诗人在苦难时代对世人的有情。

“怜悯”并不是让人变得感伤、个人化,相反,这种有“态度”的“综合”是为了客观化、社会化。史彭德指出,虽然艾略特提出了“非个人化”,但相比于艾略特,欧文的诗歌在本质上更是“非个人化”的(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20)。欧文“不是通过将私人的主观经验客观化”或者反对“自我表达”来“逃避个性”,而是通过“表达自我以外的、有关战争的、诗歌中从未表达过的现实”来实现“非个人化”;他不是创造一个私人的“自我的世界”,而是“重新创造了外部世界”(220)。“怜悯”之所以能避免感伤,是因为诗人可以“跳入极端的主观之中,并将此过程投射为一种自我怜悯”(218)。通过这种方式,诗

人成为一个“非个人化的艺术家”，“在他[欧文]的诗歌中，他不是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他是在重新创造这个外部世界”(220)。

不过，“综合”也并非史彭德的原创，而是出自他的好友、“奥登一代”中的另外两位诗人——奥登(W. H. Auden)与刘易斯(C. D. Lewis)。奥登和刘易斯早先发表文章“‘牛津诗歌 1927’序言”，这篇文章被视为“1930年代的诗人”(即指“奥登一代”)告别“他们的前辈”并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的“独立宣言”(Izzo 69)。在这篇序言中，他们提出要实现一种“新的综合(new synthesis)”，强调“情感不再需要通过‘静静地回忆’来进行分析，它应该同时被情感和理智立刻抓住”；诗歌也不再是主体的情感迷醉，而是展现“将自我当作主体还是客体之间”的精神冲突；诗歌有一种“情感的弱化”追求，渴望“个体心灵层面同步对经验进行综合和分析(synthesis and the analysis of experience)”(Auden Lewis 21-22)。这一“综合”脱离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开始思索生成意义的社会机制，反思那些“决定了价值观念”的“环境”，因此他们既关心社会性的“公共混乱”，又强调必须“生成私人领域”来述说公共话题(Auden Lewis 20)。这些观念显然成为史彭德诗论的底色，所以他才称颂奥登的诗歌实现以社会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双重视角“呈现了政治化视角下的社会”，是“综合”的最佳代表之一(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57, 262)。只不过，对袁可嘉而言，鉴于奥登后来的思想转向，奥登已经背离早期“社会综合”的路线，而同属“奥登一代”的史彭德则成为袁可嘉心目中的“综合”偶像。换言之，袁可嘉“综合”诗论背后，暗含着他在战争年代诗歌向社会“渗透”的主张。

二、“综合”：诗的社会“渗透”

袁可嘉在1962年为后来出版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撰写“后记”，在这篇内容详细、篇幅巨大的“后记”中，他总结每位理论家的主要思想和文章概要，这些内容大量涉及他对“综合”的认识。从“后记”的详尽程度可以判定，袁可嘉应该是《文选》的编者，他后来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我负责编了一部《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下编)”(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151)。此外，上文已证明史彭德1935年的专著《破坏性因素》对袁可嘉诗论的影响，而《文选》也收录了《破坏性因素》的第十三章《作家与宣言》，该章的前一章节便是上文提到的《诗歌与怜悯》。这一方

面印证袁可嘉是《文选》的编者，另一方面也再次确认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便读过史彭德的《破坏性因素》，史彭德的诗论是袁可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虽然这本论述“资产阶级理论”的《文选》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意识痕迹，但袁可嘉的这篇“后记”却记录和保留了他对艾略特、瑞恰兹等人的认识和批评。

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是袁可嘉“综合”诗论的基础。袁可嘉指出，在艾略特看来，诗人是“依靠‘统一的感性’(unified sensibility)促进各种经验起综合变化的媒介”(袁可嘉，“后记”428)。艾略特之所以要强调诗人借助“统一的感性”“综合”各种经验，是为了避免像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放纵感情，他倡导诗人克制自己的个性。与艾略特相似，瑞恰兹也强调“综合”。瑞恰兹强调“诗人正是依靠综合想象力来调和复杂的经验的”(431)。瑞恰兹之所以重视“综合”，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诗歌标准，诗歌越是能“把数量众多、互相矛盾的冲动调和起来”，便“越有价值”，而调和复杂经验的关键便是上文提到的“综合想象力”(431)。瑞恰兹的“综合想象力”是“柯勒律治学说的直接继承”，它与“艾略特的能融化一切经验”的“‘统一感性’是相近的，两者同样注重所谓有机综合的特点”(431)。

不过，袁可嘉也认识到艾略特和瑞恰兹诗论的不足，这尤其体现在他对艾略特的批评上。艾略特的“综合”虽然有效避免了浪漫主义的部分弊端，但他过分强调诗人将个人化的主观经验通过“综合”转化为非个人的艺术情绪，造成作家沦为“只是机械地综合经验的媒介”，“切断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渗透关系”，“否定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认识生活的可能”，而瑞恰兹诗论的缺点与艾略特一样，即“同样是排斥作品的思想性的”(“后记”428—431)。在袁可嘉看来，无论是艾略特还是瑞恰兹，都否定艺术认识甚至“渗透”生活的可能。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袁可嘉才将他的目光转向史彭德的诗论。以史彭德为代表的“奥登一代”与艾略特差异很大，这是被袁可嘉等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人熟知的。

史彭德曾批评艾略特的诗歌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而袁可嘉对这些批评是极为熟悉的。1948年岑鄂之翻译史彭德的文章《T. S.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发表在《诗创造》上，史彭德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在很多批评家看来是“‘逃避主义’者的文学”(S·史彭德 22)。再者，在袁可嘉自己翻译的史彭德的文章中，史彭德用很大篇幅批评艾略特自《荒原》之后远离了对社会的关照：艾略特面对社会“毁灭”寻找到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到

宗教”；他的后期作品“指示我们如何与社会无关[……]后期的诗则从时间逃开而遁入永恒之中”(史班特 33)。由此便可以理解,艾略特虽是第一位提出“综合”诗论的批评家,但袁可嘉却更多地将艾略特视为英国诗歌处于“分析”的代表,即便有“综合”的倾向,也是“宗教”“综合”。

与艾略特的“逃避主义”不同,史彭德尤为强调诗歌应该“注重社会性”。在李旦的译文《史彭德论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中,史彭德指出,“奥登一代”不仅选用生活中的意象,而且注重反映诗人在社会中的感觉,他们“要使自己浸淫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全部的感觉里。他们的诗注重社会性”(史彭德,《史彭德论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40)。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新诗”派早期刊物《诗创造》上,袁可嘉自然是很熟悉的。

“综合”或者“融合”是“诗的社会化”的重点之一。史彭德认为,艾略特的《荒原》证明“创造一在人类想像中综合全部现代经验的诗的形式是可能的”(史班特 33)。虽然艾略特证明现代诗人可以“综合全部现代经验”,但却最终走向“逃避主义”而非“社会化”,因此史彭德提出一种新的“融合”论。在译文《现代诗歌中的感性》中,史彭德指出,一首优秀的现代诗不仅需要运用语言的能力,更需要在作品中“融会贯通着他对生活所抱的态度”,其具体意义如下:“融会贯通着他的意识,和他的展望,这些意识和展望是由于感性生活得来的。这种完完全全的融合,即意识,经验,客观现实,与诗人自己观察事物的特殊方式的融合。”(Spender,《现代诗歌中的感性》101—102)

史彭德的“融合”既包含艾略特“综合”各种经验以避免过分放纵感情的诗学策略,又包含瑞恰兹“综合”对立经验以丰富诗歌的目的,但又不同于这两者,史彭德的“融合”更强调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渗透”。他的“融合”不仅囊括诗人主观的经验、意识,更要求融合客观现实。史彭德的“融合”要求诗人选取“社会”中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人的感情的结晶体,诗人通过“融合”让这些结晶体“化解”并“重创现实的象征的方面”;如此,诗歌让人了解在机器社会被压抑的欲望、恐惧和需要(史班特 31),从而实现诗歌的反抗。^③这是“诗歌社会化”的具体策略,这种艺术“渗透”、介入生活的姿态,暗含着史彭德或“奥登一代”将精神分析和左翼思想整合起来的方式,他们的诗“注重社会性[……]想从心理学与左派政治学中寻求社会的治疗”(史彭德 40)。

史彭德的这些观点显然被袁可嘉注意到了。这

篇关于“融合”的文章出自袁水拍的译文,除这篇外,袁水拍也翻译了史彭德的文章《反抗中的诗人》,作为当时关注现代诗歌的诗人,袁水拍与“中国新诗”派颇为熟悉。袁水拍早年便开始在西南联大师生主办的期刊《文聚》上发表作品,而袁可嘉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也是《文聚》的作者之一,他们熟悉各自的译文并不意外。^④其次,袁水拍后来将这些译文收录进书籍《诗与诗论》中,同为“中国新诗”派的陈敬容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些译文,她在自己翻译史彭德的文章前,特意提到袁水拍的早期译介,“袁水拍的《诗与诗论》一书里面,也译得有他[史彭德]几篇批评文章”(史彭德,《近代英国诗一瞥》29)。“中国新诗”派诗人曹辛之(笔名杭约赫)后来回忆“中国新诗”派的主要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创办情况时,也感谢袁水拍当年对这两个刊物的支持(曹辛之 384)。陈敬容对史彭德的介绍和翻译,影响了袁可嘉。在《诗创造》创刊初期,她曾写信联系袁可嘉,邀请穆旦等“北方青年诗人”为《诗创造》撰稿,从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149)。正是有了陈敬容等人的指引,袁可嘉才翻译了史彭德的重要文章《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最后,袁水拍的这些译文都出自“奥登一代”的刊物《新写作》(New Writing)。袁可嘉对《新写作》极为熟悉,他曾为《新写作》撰写书评并指出,当时关注现代文学的人都看过《新写作》,“前些年在昆明,企鹅版的《新写作》常常被注意现代文学的人们提起”(袁可嘉,《〈新写作〉》6),而如今能查到的《新写作》译文只有与史彭德相关的这几篇,这便证实袁可嘉熟悉史彭德的这些文章。

正是得益于史彭德“融合”的启发,袁可嘉才在“新诗现代化”理论中,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中的重要因素列为“现实”。不过,应该如何理解这里的“现实”?尽管袁可嘉后来解释“现实”是指“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新诗现代化》9),但这似乎也并未阐释清楚。将“现实”放入史彭德诗论的脉络里,便可以理解“现实”的意义。

“现实”并不指向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中的“现实”,而是旨在从中提炼出现代感受力的“现实”经验场域。袁可嘉虽然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却“绝对否定”诗与政治“有任何从属关系”;他肯定诗与政治相关,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如果人试图摆脱,“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新诗现代化》9)。可见,他将“政治”纳入“诗歌”范围,是为了扩大“感性半径”。这一观点与史彭德极为相似,史彭德虽然

是左翼诗人,但也批评部分“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史班特 31)。在袁可嘉的译文中,史彭德便指出,艺术家应该是做梦者,但“当想像生活中的变化”不是发生在内在的幻想的平面,而是“进入另一平面而在建筑的,机械的,组织的世界里发生”,艺术家很容易被“机械”的“外界过程所霸占”,最终“变为一个宣传家”(31)。诗应该“拥有流动的想像的品质”(31),而“意识,经验,客观现实,与诗人自己观察事物的特殊方式的融合”是由“感性生活而得来”,最终也是为了生成“感性”(Spender,《现代诗歌中的感性》102)。

再者,在袁可嘉选编并请人翻译的文章《作家与宣言》中,史彭德指出,在“毁灭的因素”(呼应史彭德的书名“破坏性因素”)已经出现并“被人们体会到”的时代,他试图寻找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不是“纯主观的、个人主义的”,“而是客观的、社会性的”,“存在于艺术家身外的世界里”的“真实”,一种“广义的政治主题”(斯本德,下编 179—182)。基于这一“广义的政治”理念,即便作为左翼作家,史彭德也进行了自我反思。他所追求的“真实”并不是很多作者所投身的“理想系统”,因为这会湮灭作者的“同情心”而失去对客观的把握;他不愿看到关心未来或理想的人以一种“优越”姿态批判他人(甚至包括反对者),而更希望这些作者能“自我批判”(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53—254)。他认为,我们不应“只观察这个世界的外壳”,更不应该“攻击”“我们的友人”的缺陷,因为我们自身也包含这些“缺陷”(216)。这种反思他人和世界,并继而投射向自我本身的态度,才可以让作者超越“外壳”而进入内部,超越“纯主观”或“个人主义”而进入“非个人化”的、“社会性”的深处,这才是史彭德所想讨论的“现实”,抑或“广义的政治主题”。

由此可见,袁可嘉的诗论和史彭德密切相关。这也验证了一些研究者的观点:“袁可嘉对现实的关注”,与现实主义诗学主张反映现实、再现现实是有本质区别的,“是主张现代诗的感受力应关注现实、包容现实”(臧棣 90)。此外,“现实”如何“综合”于“象征、玄学”之中并体现出“感受力”,最终实现新诗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现实主义,这也与史彭德、袁可嘉等人对“现代性”的思索密切相关。

三、“综合”与“现代性”

1983年,袁可嘉在文章《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中,谈论了“现代主义”在批评史中的发

展,并谈到了“现代性”,他又提起史彭德。袁可嘉指出,在英语世界中,“现代主义”获得明确意义起始于兰瑟姆,而重要的发展人物则是史彭德:关于“现代主义”,“系统的著述到六十年代才出现。第一部重要的书是史班特的《现代人的斗争》(1963年)”(袁可嘉,《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92)。紧接着,他便开始介绍史彭德的《现代人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的重要观点。这一方面证实袁可嘉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史彭德的诗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袁可嘉对“现代性”的思索并非在20世纪80年代才突然萌发,而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并未完全停歇,其线索的开端则需要追溯至他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史彭德的文章《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

在《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中,史彭德开始讨论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他认为,“现代性”不是“一种清楚的目的”,即为反对古老的传统而追求新变革,例如写新“题材”,“或者发现所谓‘新形式’,或以完全新的手法来运用旧形式”(史班特 27)。在廓清对“现代性”的错误理解之后,史彭德讨论现代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形式革命和新主题,第三个阶段是现代诗最高的阶段,即“对于包含于现代诗中诸经验的态度的发展”(28)。史彭德以其自身经历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他十几岁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将现代事物“组合于较大的诗的经验”(28)。直到后来,发现“有一种接受经验的态度可以使艺术家能将最现代的材料织入诗去,使之人性化而不再是机械化的”(28)。这里,从史彭德的生命经验可以看出,诗歌写作的重要转变点是他发现诗人需要有一种“接受经验”的“态度”。这与前文所述的“怜悯”相似,当诗人面对无法控制的战争或者难以逃避的机器时代,怜悯并接受是最恰当的对待生活经验的方式。只有如此,诗人才能接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庞杂的感性体验,并将这些感性经验融合并织进诗歌中去。这是现代诗歌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含义:“现代性”是一种目标,要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形成现代感性(29)。将现代事物或者现代意象引入诗歌,并不一定会让诗歌具有现代性,重要的是这些现代事物需要成为“诗感性底部分”,这样,艺术家“能用一种在声音的隐义及意象的构造上是现代人用的现代语言向他的同代人说话”(29)。

史彭德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明显影响了袁可嘉。袁可嘉在1948年5月再次发表讨论现代英诗的文章《现代英诗的特质》,他在文章开头便解释,讨论英诗

的特质,便是讨论“英国诗的现代性”(《现代英诗的特质》58)。与史彭德一样,袁可嘉分析了三种有关“现代性”的错误理解:从“时间观念”上将“现代”视为“远古”的对立;从“诗与传统的关系”上将“现代”视为“反传统的”;受艾略特影响,将“假古典的”视为“现代的”(58)。在梳理了错误理解之后,袁可嘉也与史彭德一样,将“现代性”视为“从现代等人的感觉形式去把握现代诗”(58)。但袁可嘉也有不同之处,他将实现“现代性”的方式列为自己所定义的“象征的,玄学的,现实的综合传统”(58)。

回到史彭德的诗论,现代性的目标是现代感性,而“融合”是将现代经验转变为现代感性的重要策略。史彭德的这一观点早在袁可嘉之前的袁水拍的译文中便得到了强调。如前文所引用的部分,史彭德指出,在一首优秀的现代诗歌中,诗人要“融合”“意识,经验,客观现实,与诗人自己观察事物的特殊方式”,而“这一种特性就是‘感性’”(Spender,《现代诗歌中的感性》102)。

这种以“融合”或“综合”为方式的“接受”,是史彭德在《破坏性因素》中的主要观点,也延续到袁可嘉的译文《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中。在《破坏性因素》中,史彭德强调“创造一种综合并接受这些东西(create a synthesis by which he could accept them)”,“所能做的最多也只能是接受它们(he could not do more than accept them)”(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218);在《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中,“有一种接受经验的态度”让诗人将“最现代的材料织入诗去”而形成现代感性(史班特 28)。这里,“接受”成为“现代”的重要标志。具体到诗歌实践中,这种“现代性”如此展开:虽然现代世界是“机械,城市,强权政治及战争”的世界,但“每一件机器,每一次战争,每一条陋巷,每一种组织都是在外在世界中,内在的人类希望,恐惧,热性的结晶”,是“人类热情的诗的象征体”,通过将这些“结晶体化解”,融入诗歌的感性之中,“重创现实的象征的方面”,诗歌便可以完成对机器时代的反抗,这是诗歌实现“现代性”目标的过程,也是诗歌将人从现代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方式(30—31)。

史彭德的这些观点延续到他在1963年出版的专著《现代人的斗争》中,又转而被卡林内斯库注意、收录于他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继而成为卡林内斯库讨论“现代性”的重要片段。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分析“现代主义”这个词语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情况时,卡林内斯库指出较早运用这一术语的是兰瑟姆,其次便是史彭德。卡林内斯库显然知道史

彭德是著名的现代诗人,所以他称史彭德为“现代主义”的“参与者”,并称史彭德的《现代人的斗争》是“一个重要批评文本”(94)。他引用史彭德的论述以说明“现代”与“当代”的对立:

因此,早在科学与工业年代,在“进步”时期,我不会称丁尼生、拉斯金和卡莱尔为现代人,因为尽管他们意识到了科学的后果,尽管他们的兴趣是最当代化的,他们仍然处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中,对于劳伦斯所谓“意识自我”(conscious ego)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有着伏尔泰式的“我”[……]萧伯纳、威尔斯和其他人的伏尔泰式的“我”作用于事件。兰波、乔伊斯、普鲁斯特及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现代的”“我”为事件所作用。伏尔泰式的“我”具有作者所试图影响的世界的特征——理性主义、进步政治等,而现代的“我”通过接受、忍耐和顺从来转变它所面对的世界(转引自卡林内斯库 94—95)。

史彭德在这段引文中区分了当代与现代。在他看来,丁尼生等人是当代的,因为他们仍然处在理性主义传统之中,拥有伏尔泰式的“我”,相信理性主义和进步政治,注重分析“我”对世界的影响;而兰波、乔伊斯、普鲁斯特以及艾略特是现代的,他们怀疑理性传统,对他们而言,现代人注重的不是自我对世界的影响,而是“‘我’为事件所作用”,他们注重观察、感受和批判“我”被事件作用于时的意识波动(卡林内斯库 95)。

“现代”与“当代”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接受、忍耐和顺从”。与前文所指出的一样,“接受”是史彭德一直重视的态度。在《破坏性因素》中,史彭德认为亨利·詹姆斯之所以能写出现代小说,便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出自“精神上的接受(spiritual acceptance)”(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196)。不过,“接受”并不意味着艺术家以消极态度逃避现实,相反,他们认识到历史已离开浪漫原始的田园而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所以他们没有逃避进虚幻的美好天堂而是接受不美好的现世;他们认识到现实生活是个悲剧,却以“悲剧的欢乐”谐谑地融合现代的经验,这在史彭德看来,是最能恰当体现现代性的感性态度(史班特 33)。

1983年,袁可嘉在文章《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中,谈论了“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从

他论述的框架和引用的文字都可以发现,他对史彭德的理解明显受到卡林内斯库的影响。在论述框架上,他与卡林内斯库相似,先谈论了兰瑟姆,然后才分析史彭德。在主要观点上,无论是他对兰瑟姆的论述,还是紧接其后对史彭德的论述,都与卡林内斯库极为相似。袁可嘉指出,在英语世界中,“现代主义”获得明确意义起始于兰瑟姆,而重要的发展人物则是史彭德。

文学界到一九二四年兰色姆发表《诗歌的未来》一文,指出现代主义——即意象主义——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真诚,表达上的准确;采用自由体,以容纳新意。从这以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就流行起来,但系统的著述到六十年代才出现。第一部重要的书是史班特的《现代人的斗争》(1963年),他区分当代与现代,认为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这些是当代作家,他们相信历史的进步,偏爱社会性题材;艾略特、庞德等是现代(派)作家,他们不相信社会进步,专写与社会疏离的个人幻景(《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92)。

在这段话中,无论是袁可嘉对兰瑟姆的简单介绍,还是对史彭德观点的细致论述,都与卡林内斯库的论述极为相近。他们在讨论史彭德时,都对史彭德诗论的定位、代表作品、主要观点进行说明,观点更是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史彭德是第一位“系统”论述“现代主义”的人,都肯定史彭德著作《现代人的斗争》是这方面“第一部重要”作品,都将史彭德的观点归纳为以萧伯纳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与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差异与对立。袁可嘉之所以能在卡林内斯库对“现代性”的丰富论述中,“截取”其中关于史彭德的细致论述,一方面说明卡林内斯库对史彭德的论述引起袁可嘉的共鸣,另一方面这“共鸣”背后也暗示着史彭德的诗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无论是史彭德的现代主义诗歌,还是他对“现代性”的论述,都经过袁可嘉的阅读、翻译和引述,成为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构建“新诗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基础。虽然这一现代化追求曾经暂时停滞,却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通过卡林内斯库的著作,成为袁可嘉论述的核心话题。

结 语

袁可嘉的“综合”诗论,起源自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却更多地接受了史彭德的影响。不满于艾略特等人将生活与艺术断裂开来,他接受史彭德以“怜悯”为“态度”的“综合”、向社会“渗透”的经验与现实的“融合”,接受所有经验并革新感性的“现代性”目标,从而将“综合”列为中国新诗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路线。

袁可嘉虽然借鉴诸多西方资源,却并非对西方诗论的简单挪用,而是借鉴西方文论以提出指引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策略。袁可嘉一再强调“现代化”不是“西洋化”,“‘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而中国新诗“现代化”是一种自己“时间上的成长”(《新诗戏剧化》1)。中国新诗现代化从“冯至、卞之琳”等诗人作品中已经萌发(《新诗现代化》9),最终在穆旦的诗歌中显出“现代化”的雏形(《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4)^⑤但在当时,新诗既面对20世纪30年代稍显自我封闭的象征主义,又面对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诗学观念的追击。此时,袁可嘉借鉴史彭德等人的诗论,提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具体策略——“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既暗含他对史彭德诗论的接受,又反映了他根据中国问题而进行的再创造。他为避免象征主义的逃避倾向或神秘色彩,将“现实”纳入“综合”之中;他为避免技艺的粗糙化和艺术的工具化,又在“现实”之外,强调“象征”的方法和“玄学”的深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等一系列举措。“现实”呈现袁可嘉的社会关怀,“象征”反映袁可嘉的诗学观念,“玄学”则体现袁可嘉的人文理想。

袁可嘉对史彭德诗论的接受和再创造,体现了他在战时压力下文艺姿态的调整和坚守。作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袁可嘉在1940年返回北京后与朱光潜、沈从文等京派人物往来密切,^⑥甚至有鼓吹充满“战斗力”艺术观念的青年人称他为“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的一分子(初稊 12—15)。在强调文艺自由的京派知识圈中,袁可嘉借鉴史彭德的诗论,反对冷漠的“自嘲嘲人”而转向有“心灵的态度”的“怜悯”;强调文学向“社会现实”“渗透”却也同时反对诗与政治“有任何从属关系”。其中的社会“渗透”反映他在战时背景下的书写姿态的调整;而“诗与政治的平行”也反映他在文艺工具论盛行下的文学坚守。这些既反映出他对“现代诗歌技巧”与“社会意识、现实意识”的结合(姜涛 138),也反映出他试图调和长期对立着

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初衷(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6)。

注释[Notes]

- ① 史彭德的诗论被引入中国时,其姓名的翻译方式多种多样,有西班牙特、S·史彭德、史彭德、史班特、斯本德等。为区分不同文章,本文在参考文献中保留了原译名。另外,袁水拍在发表译文《现代诗歌中的感性》时,将“Stephen Spender”误写为“STedhen Spender”,原因以及史彭德的诗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可参见拙文白洋本:《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22):96—100。
- ② 将在第二小节解释袁可嘉为何对此书很熟悉。
- ③ 参见西班牙特:《反抗中的诗人》,袁水拍译,《青年文艺》3(1944):30—34。
- ④ 袁水拍曾在《文聚》1945年第2卷第3期上发表译文《几首英国歌谣》。袁可嘉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他后来回忆时指出,当时联大的青年诗人们有“不少新作在当地的《文聚》杂志”发表,参见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18。
- ⑤ 袁可嘉认为穆旦的诗歌“分量沉重,情理交缠而挣扎着想克服对方,意象凸出,节奏突兀而多变,不重氛围而求强烈的集中”,这便是“现代化了”的中国新诗(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4)。
- ⑥ 袁可嘉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同教师沈从文等人关系密切;西南联大解散之后,袁可嘉又受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与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重聚;他的“新诗现代化”一系列文章都发表在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冯至等人主编的期刊上,可见段美乔:《“民主文化”: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体系的民主国家内涵》,《诗探索》1(2010):79—8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uden, Wystan Hugh, and Cecil Day-Lewis. “‘Preface’ to *Oxford Poetry 1927*.” *C. Day-Lewis: The Golden Bridle: Selected Prose*. Eds. Albert Gelpi and Bernard O’Donoghu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22.
-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 [Calinescu, Matei.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Trans. Gu Aibin and Li Ruihua. Nanjing: Yilin Press, 2015.]
- 曹辛之:《致袁水拍》,《曹辛之集》第1卷,赵友兰,刘福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84。
- [Cao, Xinzhi. “To Yuan Shuipai.” *Collected Works of Cao Xinzhi*, Volume 1. Eds. Zhao Youlan and Liu Fuchu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384.]
- 初犇:《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泥土》4(1947):12—15。
- [Chu, Du. “Literary Liar Shen Congwen and His Group.” *Clay* 4(1947): 12—15.]
- Izzo, David Garrett. *Christopher Isherwood: His Era, His Gang, and the Legacy of the Truly Strong Ma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1.
- 姜涛:《“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9):129—139。
- [Jiang, Tao.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Poetics’: ‘Modernization of New Poetry’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2019): 129—139.]
- 蓝棣之:《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2001):1—13。
- [Lan, Dizhi. “An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of Nine-Leave School’s Poetic Criticism.”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4(2001): 1—13.]
- 史彭德:《史彭德论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李旦译,《诗创造》12(1948):40—46。
- [Spender, Stephen. “On Auden and Poets of the 1930s.” Trans. Li Dan. *Creation of Poetry* 12(1948): 40—46.]
- 西班牙特:《反抗中的诗人》,袁水拍译,《青年文艺》3(1944):30—34。
- [---. “Poets in Rellion.” Trans. Yuan Shuipai. *Arts and Culture of Youth* 3(1944): 30—34.]
- S·史彭德:《T. S. 艾略忒的“四个四重奏”》,岑鄂之译,《诗创造》10(1948):20—22。
- [---. “‘The Four Quartets’ of T. S. Eliot.” Trans. Ceng Ezhi. *Creation of Poetry* 10(1948): 20—22.]
- :《近年英国诗一瞥》,陈敬容译,《诗创造》10(1948):29—32。
- [---. “A Glimpse of British Poetry in Recent Years.” Trans. Chen Jingrong. *Creation of Poetry* 10(1948): 29—32.]
- 史班特:《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袁可嘉译,《文学杂志》3.6(1948):27—35。
- [---. “What is Mordernity in Modern Poetry.” Trans. Yuan Kejia. *Literary Magazine* 3.6(1948): 27—35.]
- 斯梯分·斯本德:《作家与宣言》,《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179—190。
- [---. “Writers and Manifestos.” *An Anthology of Modern*

- American and British Bourgeois Literary Theory*. Vol. 2. Eds. Western Literature Group in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62. 179 - 190.]
- Spender, Stephen:《现代诗歌中的感性》,袁水拍译,《诗文学》2(1945):101—104。
- [---. “Sensuousness in Modern Poetry.” Trans. Yuan Shuipai. *Poetry and Literature* 2(1945): 101 - 104.]
- Spender, Stephen.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A Study of Modern Writers and Belief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5.
- 唐湜:《诗的新生代》,《诗创造》8(1948):20—22。
- [Tang, Shi. “The New Generation of Poetry.” *Creation of Poetry* 8(1948): 20 - 22.]
- 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来的脚印》,《新文学史料》3(1993):147—166。
- [Yuan, Kejia. “Autobiography: Seventy Years of Footprints.” *Historical Studies of Modern Literature* 3(1993): 147 - 166]
- :《新诗戏剧化》,《诗创造》12(1948):1—6。
- [---. “Dramatization of New Poetry.” *Creation of Poetry*. 12(1948): 1 - 6.]
- :《现代英诗的特质》,《文学杂志》2. 12(1948):58—62。
- [---. “Features of Modern English Poetry.” *Literary Magazine* 2. 12(1948): 58 - 62.]
- :《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诗的发展》,《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月18日:第3版。
- [---. “From Analysis to Synthesi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etry.” *Yishi Newspaper-Literature Weekly*, 18 Jan 1947: 3.]
- :《“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第6版。
- [---. “‘Literature of Man’ and ‘Literature of the People’ — A Search for Corrections and Harmony from Analytical Comparison.” *Ta Kung Pao-Weekly Literary Art* (Tianjing) 6 July 1947: 6]
-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海)1947年3月30日:第9版。
- [---. “Modernizing New Poetry: The Search for a New Tradition,” *Ta Kung Pao-Weekly Literary Art* (Shanghai) 30 Mar 1947: 9]
- :《〈新写作〉》,《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1947年12月7日第6版。
- [---. “New Writing.” *Ta Kung Pao-Literature Weekly* (Tianjing) 7 Dec 1947: 6]
- :《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1948年10月3日:第4版。
- [---. “Poetry and Democracy: Fifth Essa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New Poetry.” *Ta Kung Pao-Weekly Literary Art* (Tianjing) 3 Oct 1948: 4]
- :“后记”,《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421—466。
- [---. “Postscript.” *An Anthology of Modern American and British Bourgeois Literary Theory*. Vol. 2. Eds. Western Literature Group in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62. 421 - 466.]
- :《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0—101。
- [---. “Three Questions about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Criticism on Modernism and English Poet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5: 90 - 101.]
- 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文艺理论研究》4(1997):85—92。
- [Zang, Di. “Yuan Kejia: A Modernist Summary of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 in the 1940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997): 85 - 92.]

(责任编辑:张均)